

2

现代上海研究论丛

Xian Dai Shang Hai Yan Jiu Lun Cong

现代上海研究中心

· 冯小敏 主编

FENGXIAOMINZHUBIAN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

现代上海研究论丛

Xian Dai Shang Hai Yan Jiu Lun Cong

现代上海研究中心

· 冯小敏 主编

FENGXIAOMINZHUBIAN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上海研究论丛. 第 2 辑 / 冯小敏主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11
ISBN 7-80678-433-0

I. 现... II. 冯... III. 上海市—现代史—文集
IV. K295.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424 号

责任编辑 沈素敏
封面设计 杨捷
技术编辑 吴放

现代上海研究论丛(2)

现代上海研究中心
冯小敏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5.375 字数 386,000
2005 年 1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78-433-0/K·83
定价：52.00 元

目 录

上海在近代中国中心城市地位确立的历史因素及现实启示	齐卫平 肖照青	1
历史地认定四大城区空间 努力保护上海城市风貌特色	郑祖安	32
近代上海“花园洋房”区的形成及其历史特色	郑祖安	39
上海金融业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的外汇市场	吴景平	55
20世纪30年代上海企业的科学管理	张忠民	73
上海市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	钱启东	90
上海股份制改革的历史经验	何晓星	111
上海住宅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概述	张泓铭 李战军	121
试析上海经济十三年发展与动因	吴祥华 年士萍 韩 玲	129
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展望	周太彤	147
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新思考	高炜宇	159
城市综合竞争力与上海实现现代化的关系	诸大建	164
城市治理结构和城市发展	谢识予	169
城乡一体化发展 ——解决郊区“三农”问题	冯国勤	173
新一轮上海郊区经济增长分析	卓建伟 孙仲彝	181

《生活》周刊及其面向青年的人生社会理想宣传		
.....	赵文	197
上海小城镇文化保护和建设	唐立国	210
应对“入世”挑战 增强竞争实力		
——上海发展文化产业的实践和探索	朱敏彦	216
从上海工业的“两赶超”看政府在推动科技发展中		
的地位与作用	韩玲 邹荣庚	223
关于“科教兴市”战略的几点思考	胡雄飞	238
科教兴市战略：上海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举措	毛林根 曹雷	242
做大做强上海教育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胡瑞文	250
永立潮头		
——上海城市精神的历史回眸和启示		
.....	张永斌 沈建中 黄坚 韩玲	260
塑造城市精神 焕发创新活力	花建	275
对培育上海城市精神的五点看法	鲍宗豪	278
城市转型中近代上海会馆的特点	郭绪印	283
1927—1937年上海律师业发展论析	张丽艳	291
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的成立与上海市民自治运动		
.....	唐洲雁 宋佩玉	302
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党建新格局的构筑		
——试析上海加速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党建工作新探索		
.....	顾建键 马西恒等	314
新时期上海基层党建的实践和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的		
思考	周敬青 吴海红 丁晓强	332
上海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及其对执政党提出的新问题		
.....	谢华平 袁方	369

上海郊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探索与创新	吴振兴 徐国梁 崔桂林	379
新时期上海多党合作的特点及进一步发展上海多 党合作的若干思考	桑玉成 黄福寿	385
新情况 新问题 新思路		
——对新世纪初上海民族工作的思考	马定华 彭高成	392
对新世纪初上海市少数民族人口情况的研究	鹏 程	403
叶挺领导的新四军与上海、上海人民	张文清	412
陈毅领导上海解放之初的经济恢复工作	姚会元	425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解决就业问题的思想 在上海的实践	袁志平	438
2003 年现代上海研究综述	贾 彦	451
附录:2003 年现代上海研究部分文章目录	徐 平	466
后记		487

上海在近代中国中心城市地位确立的历史因素及现实启示

齐卫平 肖照青

一、上海的崛起及其在近代中国城市中的地位

(一) 上海的崛起与江南区域中心的位移

1. 上海城市的形成

现今的上海是中国的直辖市,地处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南北海岸线中点。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界长江入海口。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全市南北长约 120 公里,东西宽约 100 公里,总面积 6 340.5 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0.06%。2002 年末,全市户籍人口 1 334.23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1]

上海是个外延不断扩大的概念,其历史可追溯到几千年前。但现代城市意义上的上海应该从唐天宝十年(751)设华亭县于后来的松江县城开始算起。^[2]设立华亭县,表明唐朝时期上海地区的经济已得到较大的发展,也从此奠定了后来上海地区行政格局演化的基础。经过数代的发展,到明代后期,上海已经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贸易城市,商贾云集,谚号“小苏州”。^[3]清代,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棉织手工业日益兴盛,不同区域之间物资流通渐次扩大,使上海在经济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并且为其在近代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2. 江南区域中心的位移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由于行政建置的变化及习惯等因素，历史上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本文所说的“江南”，以明清时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十府”为核心区域，相当于今上海市、江苏南部及浙江一带。唐宋以前的江南偏处一隅，远离中国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区，因而也远离政治、军事集团冲突的核心，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享有一个相对安宁、稳定的环境。从晚唐到宋代，江南地区间或也遭受战火侵扰，但总的说来是宁静、和平的。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江南成为全国的赋税重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鸦片战争前，人们公认：“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4]富足、安乐使江南苏、杭一带渐享“人间天堂”的美誉。而此时，上海的重要性却一直不为人所注意，还是西方人发现了它地理上的优势。但是西方人知道上海已是清朝末年了。在道光十二年(1832)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来到之前，西方很少有人听说过上海的名字。1832年以后，西方人才真正意识到上海的重要性。这一点从“阿美士德号”船员胡夏米等人的报告，以及此后一些到过上海的商人、传教士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他们认为：上海这一地区“在对外贸易中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过去竟然未曾引起相当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5]“上海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县城，但却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紧邻着富庶的苏杭地区，由此运入大量丝绸锦缎，同时向这些地区销售各种西方货物”。^[6]上海的这些优越条件深深诱惑着西方国家，十年后，他们终于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这一海上大门。

于是，紧邻富庶江南的上海，随着租界的开辟与外国企业的设立而在经济发展上占据优势。开埠初期的上海，在进出口贸易、航运等方面显示出勃勃生机，洋场的繁华表面上也能与苏、杭相媲美。然而，一个城市的壮大，特别是作为中心城市，不仅仅体现在

一些经济指标上,传统江南的中心城市仍以其深厚的基础保持着它们重要的地位,吸引着大量人口,至少在上海开埠之初的十多年中是如此,江南区域中心从苏、杭转移到上海,有一个渐进过程。

首先,小刀会起义、太平军战事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成为上海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缘。上海的发展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种种条件,但是战事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却是一个最直接的动因。1860年5月,李秀成统帅数万大军东征苏州和上海,6月2日,攻克苏州,并以苏州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国苏福省。随着战局的逆转,苏福省成了湘军、淮军的必争之地。1863年初,李鸿章统帅的淮军向苏福省挺进,李秀成与之展开了惨烈的大搏杀。在这场搏杀中,苏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富庶与繁华如梦幻般随风而逝。和苏州的命运相似,在太平天国战事的冲击下,杭州也加速走向衰落。战事使上海周边的许多百姓纷纷避入租界,这些难民不仅为上海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还为上海带来了近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商人借经商之名,为避兵之实,既连袂而偕来,即内地绅富,亦以租界处中立地位,作为世外桃源。商人集则商市兴,绅富集则金融裕,而领袖商业之金融机关,则次第开设矣。”^[7]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

其次,上海作为近代运输中心的崛起,分流了江南其他港口的大部分转运贸易。江南地区在近代以前的兴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转运贸易。但是,上海开埠以后,外资航运业在上海纷纷创设,对整个长江中下游传统航运业冲击巨大。“外国轮船,尤其是英国轮船,正在逐步而稳步地垄断沿海航运……中国人充分感觉到把他们的货物交外国轮船运输能有迅速和安全的优点,他们知道外国轮船可以在任何季节和季候风里航行,同时,他们也很精明,他们重视用外国轮船可以保险的方便。”^[8]而与外资航运业相比,“内地商船资本巨大,……捐饷亦巨,嗣因停滞不行,生意淡泊,颇行不足”。^[9]因此,“洋船就逐渐排挤了中国木船,成为运载中国产品进

行沿海贸易的工具”。^[10]渐渐地，江南各地的转运贸易很快移聚到上海一地，给上海带来了繁荣。

第三，江南的商业资本逐渐依附于上海外商洋行，成为买办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而失去独立联结生产部门的能力，不能使货币财富的积累与传统的工副业同步发展。关于中国商业依附于外商的状况，杜恂诚先生有个比喻：“鸦片战争后，……中国首先出现的是资本主义商业和商业资本家。而中国资本主义商业的‘毛’，却是依附在外国产业资本的‘皮’上的。”^[11]与此类似，江南的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同样是依附于上海金融业和工商业的“毛”而已。上海开埠以后，外商洋行纷纷设立，将内地大量钱庄、商号纳入买办化的购销网中。这些钱庄和洋行利用向上海吸收的资金为上海洋行推销洋货，收购土产，成为依附于洋行的买办性商业网中的一环。^[12]因此，虽然江南在近代颇为发达，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但这些资本却大量流向上海，成为上海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来源之一，江南资本失去了独立进入生产部门、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能力，使江南与上海呈反方向发展。

（二）对上海迅速发展的评价

上海的迅速发展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只要看一下当时人们对于上海的形容，便可以知道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1881年，人们已经将上海与巴黎相提并论。《申报》的一篇社论写道：“人之称誉上海者，以为海外各地惟数法国巴黎斯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13]

类似这样的时誉不断见诸报端，中国人自豪地将上海列入世界级大都市的行列：“沪北一隅，通商总埠，不独两京四镇十八省无此壮丽，无此繁华，即英之伦敦，法之巴黎，美之纽约，日之东京，均与之相埒焉。”^[14]

而在清末民初著名的章回小说《商界现形记》的序言中，作者甚至认为，上海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海外其他城市，走在了前

面：“海上^[15]一隅，弹丸之地，自华洋互市、中外通商以还，遂成巨埠，繁华等于巴黎，蕃盛驾于伦敦。六大洲五十三名邦，一统志二十二行省之以有易无，行商居贾，咸来莅止。吾谓英之伦敦，未及吾海上之富有也，法之巴黎，无过吾海上之奢丽也。六十年来，吾海上乃仙都也，吾海上乃乐园也。”^[16]

在清末，上海已有“世界五大埠之一”之称。^[17]1930年张群在为《上海之工业》所作的序中就称：“上海特别市居民达二百七十余万，为我国商业最盛之地，亦为世界六大都市之一，工商事业宜其蒸蒸日上。”^[18]1935年出版的英文《上海指南》(All About Shanghai)中，对上海的描述用了三个排比句：“上海，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东方的巴黎；上海，西方的纽约。”书中解释所谓“世界第六大城市”，是就城市人口而论的。按照1934年世界大城市人口的排名，前六名依次是伦敦(8 202 218人)、纽约(6 930 446人)、东京(5 312 000人)、柏林(4 000 000人)、芝加哥(3 376 438人)和上海(3 350 570人)。^[19]

1936年的《全国银行年鉴》也明确地指出了上海的重要地位：“上海初不甚发达，嗣以八十年之惨淡经营，始有今日之宏大規模。现人口三百余万，工商繁盛，交通便利……工业方面，举凡纺织业、饮食品工业、日用品工业、化学工业、莫不荟萃于此。商务方面，若以福州以北，山东以南，国货之出口，多以上海为必经之地，洋货之输入，亦由上海分散各地，长江流域无论矣，甚至滇、黔、陕、甘、豫、闽、鲁省之大半，皆为上海贸易之范围。……其为我国经济之重心，至为显明。”^[20]

二、构建上海中心城市地位的四大支柱

(一) 发达的航运条件

上海是一个天然良港，但是在开埠以前，它的优势还远远没有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发挥出来,仅是一个相对重要的转运港。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了数千里的沿海航线和千余里长江航线,处于长江和沿海航线枢纽位置的上海自然成为外资轮船航运业兴起的中心。1862年,美商旗昌洋行以100万两白银的资本率先在上海设立上海轮船公司,即旗昌轮船公司。随后,外资轮船公司纷纷设立。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这是上海第一家中国资本的轮船公司,以上海为枢纽的航运业从此进入了轮船招商局与太古、怡和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远洋航运上,英、法、美和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开辟了到上海的国际航线,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各国对华航运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切外国轮船,不论其最后目的地上哪儿,它都要先开到上海。”^[21]长江及内河的航线,随着几个不平等条约的签署而渐次开放。从1858年被迫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允许向外国轮船开放长江沪一汉段到1895年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开放长江上游段,整个长江流域几乎全线开放。川江航运的开通,重庆等长江上游城市的开放,推进了上海与长江上游沿岸城市之间的直接贸易。到20世纪初,上海已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

(二) 繁荣的贸易往来

上海在商埠开放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内贸易枢纽港,主要进行中国沿海地区和长江、太湖流域的物产交流。直到1843年,《南京条约》将上海辟为商埠,中外贸易才取代了埠际贸易在上海商业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上海也在19世纪50年代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外贸中心,此后这一地位不断强化,整个近代都没有动摇过。上海进出口贸易货值,从1864年的6 402万关两上升到1924年的95 845.5万关两,总计增长了1 397.1%,进出口贸易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始终占一半左右。

在转口贸易、国内埠际贸易方面,上海也起着枢纽作用。从上海出口的土货来自各地;从上海进口的洋货,大多也要运到内地其

他口岸。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全国最大之转运码头。内地货之运往外洋及沿海各埠者，或外洋货物之运往内地者，多以上海为转口地点。即一切货物先运至上海，再分运各地。上海商务之繁盛，其最大基础即在于此。……故上海实为全国贸易之分配中心”。^[22]上海已经确立了中国国内外贸易中心的地位。

（三）雄厚的工业基础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外国人投资的近代化的工业。《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上海外资工业更是飞速增长。据统计，1913年上海35家主要外资工业企业的资本额总计5346万元。^[23]到了1928年，上海外资工业共有130家，资本总额达到2.27亿元，分布在纺织工业、饮食品加工业、印刷造纸业、化学工业、木制品加工业、家具制造、机械工业、卷烟工业、冶炼工业等各个行业，以及水、电、煤等公用事业领域。

开埠以后，中国人效仿外国商人做生意的意识相当强，办事能力与效率也都相当高。在近代化的工业领域中，凡是外商投资设立的行业，很快就有华商资本投入。1865—1894年间，华商投资的具有相当规模的行业包括船舶机器修造业、印刷业和机器缫丝业，并涉及面粉工业、火柴工业、轧棉业、制纸业等领域。只是它们大多刚起步，投资额也有限。甲午战争以后，近代大工业在上海迅猛发展，棉纺织工业迅速崛起，缫丝工业、面粉工业、造纸工业等门类迅速开拓，从而奠定了近代上海工业的基本结构特征——以棉纺织业为主体的轻纺工业占主导地位。^[24]20世纪初，上海的工业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1933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1亿元，超过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奠定了上海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25]

（四）优越的金融体系

上海近代内外贸易迅速发展，对金融业的要求也就远远超过了传统时代的要求。在19世纪后期，上海聚集了大量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也迅速发展，已初步成为全国金融中心。

外资银行方面,自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以后,到1922年,上海共有外资银行30余家,是外资银行在中国最为集中的地方。^[26]民族资本银行方面,自1897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办,到1935年,上海共有银行机构182个。1936年在沪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的营业资力占全国近一半。上海的金融业“资本日益充实,组织日益完善,业务日益发达,已执全国金融之牛耳矣”。^[27]

在金融业务方面,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外汇市场。开埠初期,国际汇兑在上海这个市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行市,19世纪70年代以后,汇丰的雄厚资金已经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炒卖汇票及硬通货,于是,在中国以及远东出现了各地外汇及硬通货价格要看上海行市,而上海则以汇丰挂牌为准的外汇市场牌价体系,这就意味着以上海为中心的外汇市场已经初步形成。^[28]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外汇市场不仅是中国的国际汇兑中心,即使在国外市场上也有相当的势力,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与沟通起了巨大的作用。^[29]

上海成为金融中心还表现在上海金融开始介入国家财政。1894年甲午战争和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对上海的金融业而言,则是一次畸变的开端。为了偿付战争的军费及赔款,清政府七次向英、德、俄、法四国举借巨额外债,而每一笔几乎都与江海关和上海的外国银行直接相关。上海的“外滩银行”和赫德控制下的江海关,从此成为西方各国联手控制中国财政的主要工具。^[30]

三、上海城市中心地位确立的历史因素

(一) 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亚当·斯密指出:“都市中的‘秩序、好政府以及个人的自由、

安全’，是吸引乡村富裕居民的‘避难所’。”^[31]这一点在上海城市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外国控制所提供的安全保障，是租界创立的早期当资本在那里开始集中的关键时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32]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上海社会的相对稳定提供了安全保障，对于上海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首先，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安全的投资环境。租界当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制定了一整套相应的法规，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安全保障。开埠次年，在沪英美商行仅为 11 家，到 1845 年外国商行激增为 120 多家，至 1876 年更达 200 家。20 世纪以后外资对上海的投资更为集中。1931 年外国人对上海投资额为 11.1 亿美元，占其在华投资总额的 34.3%。^[33]

其次，为国内人口与民族资本提供了避难与投资的理想处所。“甚至租界外面的华商企业，也得益于外国人所享有的特权。因为当国内发生骚动或叛乱时，他们也分享到外国炮舰和军队的保护，不受中国部队意图占领这些地区的威胁。”^[34]于是，每当中国发生动乱，外地人口就纷纷涌入上海，他们带来了上海繁荣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到了上海以后就投资航运业、钱庄，或兴办其他企业，为资本主义在上海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二）外资企业的示范作用

1. 先进的生产技术

外国进口的工业品和外资在沪工厂的产品都是在先进技术装备下生产出来的，本国私人资本企业生产的产品，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难同外国产品竞争。因此，顺应新技术发展的潮流，引用西方新的先进设备，掌握先进技术，是本国私人资本企业能否在同外资竞争中取得生存发展的关键。例如，中华书局在初创时仅有资本 25 000 元，工作人员十多人。随着业务的扩展，这种小规模的作坊式生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于是，书局一方面增加资本，建设厂房，置备机械；另一方面，“派技师出洋

留学,研究艺术,举凡雕刻版、凹凸版、三色版、橡皮版、锌版、铅版、日新不已,精益求精”。在不断的学习和改进中,印刷质量大大提高,营业额也蒸蒸日上。民国初年时,年营业额已超过百万,到了19世纪20年代以后,年营业额增至400万,在教育界和文化界均有相当重要的位置。^[35]

2. 灵活的经营方式

上海早期的近代商业企业主要产生于同国外贸易密切相关的行业中,如船舶修造、洋布、百货、五金、颜料、西药等。近代企业的经营机制,对于小农经济结构的中国社会最初是完全陌生、缺乏市场的。但随着洋行的商品倾销与市场开拓,“一批新型的中国商人,在通商口岸同外国侨民的交往中,学到了西方经营企业的方式”。^[36]发昌机器厂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开始制造小火轮,至70年代末已经制造多艘。但当时外国轮船竞销激烈,国产轮船销售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发昌机器厂便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所造轮船“或租或买”,均由客户听便。^[37]这样,既可以减少一部分资金的积压,又能够用产品作为销售的活广告。另外,由于当时的缫丝工业正在兴起,发昌机器厂至90年代以后,还增加或扩大了纺纱机、轧花机、缫丝机等的修造业务,^[38]使经营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增强了在竞争中的生存能力。总的说来,中国近代产业大多由外资首先创立并进行市场开拓,中国的近代民族企业受此影响和示范又逐渐形成。上海由于洋行出现较早且最为集中,民族企业最容易接受其制度示范并有条件进行比较分析,取长补短,从而在经营管理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

(三) 移民资源的集聚效应

上海在开埠后由一个普通的地区商埠迅速成为全国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其优越的地理条件、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固然是主要原因,但移民“一直是上海最大的资源之一”,近代从各地涌人上海的移民数量可观,他们用勤劳的双手

铸造了这座城市的繁华，支撑着她的辉煌。上海是公认的移民城市，移民资源与其他因素汇聚成强大的发展定势，为上海的崛起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1. 保证了上海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

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的变动，但人口的变动对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反作用。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要求社会保持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并能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适度人口。上海开埠后不久，就有广东及邻近的浙、皖等地的移民进入上海，他们大多集中在外国人开办的船舶修造业、出口加工业及官办、商办的近代企业中。如江南制造局在“前清光绪、宣统年间，通常用五六千人……这般工人的籍贯，多半是广东、宁波、湖北、安徽、天津等处地方”。^[39]以后随着上海外贸重心地位的逐渐确立和近代工业的发展，上海城市的人口容量大大扩大，而数以千百计的外来人口的迁入，正符合上海经济发展的需求，使上海得以顺利完成经济职能的大转变。广泛的劳动力资源是近代上海迅速崛起的重要保障。

移民为上海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还反映在质量上。一般而言，主动迁移者大多为未婚、年轻或有一技之长的男性。晚清上海移民的情况亦然。30年代上海的男性在人口总数中占绝对多数，而21—40、41—60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合计占上海总人数的57.31%，居绝对优势。^[40]这种性别、年龄结构保证了上海在近期内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劳动力后备资源，使上海人口素质相对提高，其形成的集聚效应，对上海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2. 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本

迁居上海的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战乱等原因迁寓沪上的富豪人家，他们携带了大量的货币财富，“绅商之挟厚资而寓居上海者，且接踵而起”。^[41]以在我国最早形成并具有一定规模的缫丝工业为例，至1894年，上海共有8家民族资本缫丝厂，资本